

晚清小说读者阅读取向对近代出版业的影响

王婉如

(北京大学 人文学部, 北京 100871)

摘要:晚清时期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和思想上给予了读者新鲜的体验,使得读者购买意愿上涨,同时,读者阅读取向的选择也使得出版业更乐于出版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它们不断调整出版策略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晚清出版业与读者紧密相连,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以展现出出版业与读者相互影响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晚清;小说读者;阅读取向;近代出版业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2-0092-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2.025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Readers' Reading Orientation on Modern Publishing

WANG Wan-j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inking and artistic forms, attracting more read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ders' orientation makes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bring out the books that readers like, so it has been adjusting publishing strategies to satisfy the readers' nee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c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ader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reader; reading orientation; modern publishing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106] 此篇文章吹响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号角。梁启超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了“新一国”“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乃至“新人心”的地位。在当时,不仅粗通文墨的贩夫走卒在看小说,就连那些读书人也“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2]。梁启超的一番话表明他了解大众的阅读趣味,而这是一个和小说读者群体密切相关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某一程度上可与通俗文学画上等号。大众代表着近代出版业的市场,有读者才有市场,读者多了才会提高小说产品的市场供应量,而不是减少小说的发行。因此读

者的购买愿意和小说的发行,两者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读者反应带动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书局和其他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在市场上什么样的书籍受读者欢迎就会不断再版,各个书局也依其本身条件出版数量和质量不等的图书。据统计,1907年市面上流通的小说书籍为121种,有15家书局涉足这一领域。这些书局的小说出版数量分别为:商务印书馆44种,小说林社41种,新世界小说社17种,广智书局6种,作新社2种,点石斋2种,中外日报馆、鸿文书局、申江小说社、有正书局、时报馆、开明书店、一新书局、时中书局、文振学社各有1种^[3]。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数据,仅依据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小说书籍统计而得,其实当时多家杂志社参与其中,瓜分小说市场这块大饼。《月月小说》便是于1906年创刊,当时的发刊

词提到《月月小说》欲发行的小说种类有历史小说、哲理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侠情小说、国民小说、写情小说、滑稽小说、军事小说、传奇小说共11类,并对上述提及的小说的内容性质分别做了介绍。从发刊词中除了看出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题材外,同时也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反应和接受程度对《月月小说》欲出版内容的影响。兹节录《月月小说》发刊词如下:

例胜班猪,义仿马龙。稗官之要,野史之宗。万言数代,一册千年。当时事业,满纸云烟,作历史小说第一。天有飞鸢,渊有跃鱼;倏忽如矢,环转如车。事悟于脑,理见于心。味道研几,探蹟钩深。作哲理小说第二。人有敏悟,事有慧觉;非夷所思,钩心斗角。想入非非,覲不数数。有胜百智,无失千虑。作理想小说第三……抒我丽辞,言其真相。作传奇小说第十一^{[1]116-117}。

《月月小说》发行的内容,皆为迎合读者取向。这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小说比以教诲为目的或以审美为目的的小说销路好的原因^[4]。小说期刊成了书局与图书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使书局更能具体地了解到市场对小说图书的反应,以便做出相应的决策。许多长篇小说最初都曾在小说期刊上连载,如果投放市场后产生影响,受到欢迎,那么书局就会推出单行本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经过期刊的先行试探,可大大降低书局的经营风险^{[5]234}。且小说期刊皆带有连载和广告

趣味性的办刊风格。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因此,它在大城市曾风靡一时。而它是缘起自1900—1911年的那些小说,如:《小说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等,这些小说便是它“基础”的由来。它的出现可以让我们从编辑的角度讨论这些小说及杂志,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书局的心态,以及证明市场经济在商业出版中占决定性地位。

二、晚清时期的小说期刊内容

晚清时期,文明书局最初是以编辑经营蒙学教科书见长的,但后期则把出版笔记小说当成主业之一,如出版了《说库》(由进步书局王均卿编辑,后归文明书局发行),有光纸石印、线装本共60册,收入笔记170种。《说库》的例言有云:“丛帙之刊,首戒割裂,明代说郭等书,恒蹈此弊,破碎遗着,古人呼冤。本编甄入,以存古籍。近日仿刻古籍,都非善本,鲁鱼亥豕,讹夺迷目。本编甄录,半系密本抄本,名家手校未经刊印本,其以刊者,则依据江浙藏书家之精本源刻本,校订之功,其详其慎。”^{[7]79}从汉朝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起,至清朝黄仁《大狱记》止,每种都由编者撰写题要,使读者对书的内容一目了然。文明书局还出版了分8函、160册的《清代笔记丛刊》,以及共48函、500册的《说库》姊妹篇《笔记小说大观》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学术上或史料上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902—1910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865种2042册,其中文学类就占到220种639册。而所谓文学书,实际

此1900—1911年创刊以小说命名的刊物达到了21种,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序分别为:1902年横滨《新小说》(月刊)、1903年上海《绣像小说》(半月刊)、1904年上海《新新小说》(月刊)、1905年上海《小说世界》(半月刊)、1906年上海《月月小说》(月刊)、1906年上海《新世界小说社报》(月刊)、1906年上海《小说七日报》(周刊)、1906年广州《粤东小说报》(不详)、1907年上海《小说林》(月刊)、1907年香港《小说世界》(旬刊)、1907年广州《中外小说林》(旬刊)、1907年广州《广东戒烟新小说》(周刊)、1907年上海《竞立杜小说月报》(月刊)、1908年香港《新小说丛》(月刊)、1908年宁波《宁波小说七日报》(周刊)、1908年上海《白话小说》(月刊)、1909年汉口《扬子江小说报》(月刊)、1909年上海《十日小说》(旬刊)、1909年上海《小说时报》(月刊)、1910年上海《小说月报》(月刊)、1910年《小说画报》(出版地与形式不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市民阶层日渐庞大。“写情小说”逐渐演变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上海文坛日益泛滥。这种作品迎合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的文学要求,体现了当时社会日渐殖民地化、小市民日渐增多、社会风尚日趋败坏的趋势。1914年起,刊载“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的小小说期刊迅速增多^[6],《礼拜六》便是其中的代表,它明确地表现了追求消遣性、娱乐性和

趣味性的办刊风格。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因此,它在大城市曾风靡一时。而它是缘起自1900—1911年的那些小说,如:《小说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等,这些小说便是它“基础”的由来。它的出现可以让从我们从编辑的角度讨论这些小说及杂志,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书局的心态,以及证明市场经济在商业出版中占决定性地位。

表1 1911年12家书局与其出版的小说册数一览表^[8]

序号	书局	册数	序号	书局	册数
1	商务印书馆	257	7	新世界小说社	30
2	小说林社	173	8	文明书局	27
3	改良小说社	116	9	小说进步社	26
4	上海书局	61	10	申报馆	24
5	广智书局	60	11	集成图书公司	22
6	群学社	44	12	有正书局	22

注:此表参考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而成。

至于晚清时期的小说宝库《绣像小说》则创刊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源起于张元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之后,看到广智书局的《新小说》杂志刊载了梁启超的《侠情记传奇》、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觉得应该大大提高老学究严禁子弟阅读的小说的地位,于是他聘请李伯元来创办《绣像小说》。《绣像小说》中的“绣像”原指小说中插入的

人物图像。该刊为半月刊,线装本,双页折订,第 1 期封面为一枝牡丹花,第 2 期起为开屏的孔雀。内容分小说、翻译、传奇、弹词、杂着等。曾刊过红都百炼生的《老残游记》、蓬园的《负曝闲谈》、惺庵的《世界进化史》、洗红厂主的《泰西历史演义》、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姬文的《市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吴趼人的《瞎骗奇闻》、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缘》、血泪余生的《花神梦》、吴蒙的《学究新谈》、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等等^{[7]161}。这些丰富的小说题材和内容,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也因此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龙头地位。

其他如《月月小说》1906 年 11 月创刊,1909 年停刊,共出 24 期,内容主要为小说,其余为论文、戏曲等。在《月月小说》上吴趼人的作品居多。《小说林》则是 1907 年创刊,1908 年 10 月停刊,共出 12 期,内容以著译小说为主,兼及关于小说的理论与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孽海花》(曾朴著,笔名署“东亚病夫”),从第 1 期刊登,影响甚大。《新小说》则是由梁启超主办。《绣像小说》与《月月小说》《小说林》《新小说》被阿英喻为“清末文艺杂志的四大权威”。表 2 即把四者创办的时间、地点、代表作及发刊形式与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表 2 4 家小说期刊的基本情况

名称	创办时间和地点	代表作	刊期、总期数和主要内容
《绣像小说》	1902—1905.12 东京	血泪余生《花神梦》、洪都百炼生《老残游记》、忧患余生《邻女语》、旅生《痴人说梦记》	半月刊/72 期,小说反映了外国侵略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
《月月小说》	1903.5—1906.4 上海	华琴珊《续镜花缘》、白眼(许优民)《后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劫余灰》	月刊/24 期,多刊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品,开“鸳鸯蝴蝶派”之先声
《小说林》	1906.9—1908.12 上海	曾朴《孽海花》、吴梅《轩亭秋》、南亭亭长《地狱村》	月刊/12 期
《新小说》	1907.1—1908.9 上海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日本的菊池幽芳氏《电术奇谈》、吴沃尧《九命奇冤》	月刊/24 期,晚清首创以新小说命名的文艺杂志

注:部分参考了文献[5]的第 5 章“晚清新政时期的图书市场表格”,233 页,以及《文学》第 5 卷第 2 号(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 8 月 1 日)。

及展,仅有图书出版业的及展和供有的阅读似又停,小说期刊就会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狄楚青创办《小说时报》,就是因为他“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好的印刷所,铅印石印设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可以登广告”^{[9]358}。除了有正书局外,其他书局也具有这方面的优势,皆拥有自己的印刷所和铅印石印设备,能够保证连续性定期刊物的按时出版,书局的编辑队伍则为刊物提供了稿件和人手,且晚清时期交通工具的发展,扩大了发行网络,打破了期刊发行的地域限制。

三、租赁唱本及稿酬制度的出现

清末北京的馒头铺除了卖蒸食以外还兼营书籍的租赁业务。当时的出版业发达但并不是人人有钱购买书籍,因此租赁业兴起。租书的手续与现在相仿,先拿相当的钱文交给馒头铺作压账,然后取书,1 本限 1 日看完,第 2 日再来换第 2 本。为了避免书被偷,书的封面都印着很长的图章,图章内都有很多内容,如永隆斋钞本《福寿缘鼓词》上的长章云:“本斋出赁四大奇书,古词野史,一日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变价为本,亲友莫怪。撕书者男盗女娼。本铺在交道口南路东便是。”兴隆斋钞本《大晋中兴鼓词》上的长章云:“本斋出赁钞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

多人伴八公取回书册内,1900 年 4 月 21 日

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版权概念,而是全凭良心在办事,租赁店除了罚钱了事并不能作什么更有效的吓止。当时书的租金要比售价低廉,如据光绪元年三美斋《天赐福》书面标的租费是九文钱;但书的遗失赔付费用却相对较高,如聚文斋钞本《三国志鼓词》上有一个图章说:“失书一本,赔钱一吊。”俗称的一吊就是制钱一百文。根据天津大公报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光绪二十一年左右北京馒头铺(租赁店)的铺号、地址及提供的书籍,如表 3 所示。

出版社对各租赁店借阅率最高的书籍,会进行改版或再版来谋取利益。在中国古代是无所谓稿酬的^[10]。中国现代稿酬制度的产生,人们往往会提及《申报》在其创刊号上所刊登的那段话:“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篇说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这就是说,在 1872 年《申报》创刊前及发展初期在上面发表文章非但不给稿费,作者自己还得掏钱。

1902 年 6 月天津《大公报》创刊时,在其章程、序、告白中并没有说明向该报投稿是否支付作者稿费,只是说:“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报亦为采登。”^{[5]191}1 个月后来为了吸引到更多优秀的文章,征文活动规定:一等奖赠亚东形

势图一份、铁路电线图一份、大本《新政真诠》、送阅本报三个月；二等奖赠《新政真诠》、送阅本报二个月；三等奖送阅本报一个月。在此才开启征文会有“奖品”的先例，出版者需要稿子出版，投稿的人因此受惠。1903 年 3 月，《大公报》为一个名为“苍梧守旧公社”的组织刊登征文广告：时间截止公历 5 月份，文章“写东、西文均可，非二万言以外者不收，多则按万数递加”，到公历 8 月 1 日，评定获奖作品，分五等，各等级奖金依次递减，“头等赠洋银 50 元，二等 30 元，三等 10 元，四等 6 元，五等 4 元”。首次明言稿酬，作家也因此得到了著作录用后的资金保障。

表 3 光绪二十一年左右北京馒头铺
(图书租赁店)的基本情况

铺号	地址	出租书
永隆斋	交道口南边路东	《三国志》《隆庆升平》《福寿缘》《济公传》《锋剑春秋》《拾粒金丹》《桃花记》《吴越春秋》《和北番》
永和斋	八条胡同西口外路西	《三国志》《隆庆升平》《吴越春秋》《和北番》《锋剑春秋》《拾粒金丹》《桃花记》《济公传》
兴隆斋	施家胡同东口	《天贵图》《五岳扫北》《碧玉环》《双仙缘》《大晋中兴》
隆福斋	东四牌楼隆福寺神路街路东	《三国志》《济公传》
吉巧斋	北新桥南	《三国志》
聚文斋	安定门内姑姑寺胡同庙内	《三国志》
鸿吉斋	东安门内	《桃花记》
保安堂	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口口羊市路东	《吴越春秋》
天顺斋	护国寺西口外路西	《双官诰》
崔记	八面槽	《西唐》

注：参考 1936 年 2 月 27 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

到了 1906 年，据包天笑回忆当时已流行以字数计稿费的风气，按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 2 元为标准，也有每千字 1 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 5 角的^{[9]324}。1907 年梁启超为寻觅两个专栏作家开出的条件为：“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 3 元。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 4 元而止，普通者亦 3 元为率。记载门则 2 元内外，此其大较也。”^[11] 稿酬制度逐渐建立，除了这种一次性稿费，同时也有如严复《社会通论》一书出版合同规定的 40% 的版税。

而包天笑是最早“吃稿酬”的文人，他最初到《时报》薪水

一下就定到 80 元，按照当时上海报馆论说每篇 5 元、小说每千字 2 元的标准，他每月写论说 6 篇，还有大约二万多字的小说。对此他十分满意，认为 80 元的薪水已经比他任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9]317}。至此，实物稿酬、作价稿酬、按字数计酬、版税等稿酬支付形式都先后出现了。

四、结语

晚清小说读者的阅读取向，会影响出版社及书店用各种方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根据读者喜欢阅读的内容进行书籍的约稿及出版。当稿源不足的时候会采用支付稿费的方式来增加稿件数量，以便于出版。此时，市场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其内含发生了变化，它“进一步发展成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综合体”^[12]。小说的出版地大多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尤其是在上海，新型文人作为近代上海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文化群体，他们首先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刊物的雇佣者，他们是随着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而不断集结成群的^[13]。

在 19 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刊物，所谓报纸、邸报或官门抄主要刊登皇帝诏书、皇室动态、官员任免升黜等事项，阅读对象仅限于统治阶级中上层，所以称不上大众传播媒介^[14]。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读者群的扩大，可以说到清王朝垮台前夕，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出版业的格局已经在上海形成。其标志是 1906 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

章程》出台。这不仅意味着文化出版业已经纳入了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轨道，也意味着出版业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5]。在销路与市场的制约下，出版业以满足大众的娱乐和求知的需要为宗旨，把大众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而当时的清政府只要出版业不反对政府，不海淫海盗，其余皆是按照商业通例来管理的。

读者是图书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读者的需求和规模最终决定着图书市场的大小和生命力。无论是潜在的读者或者是有现实购买力的读者，皆成为了图书市场旺盛的要素。而这些读者购买的动机则包含了各种因素，一部分读者是为了追求名人效应，或是赶时髦而购买；另外一部分则是提高自身思想修养、文化水平，或是为了消遣享受、打发时光。这些形形色色的读者代表了真正“消费”图书的人，针对这些人图书出版业调整出版策略，迎合消费者需求，因而市面上各式图书便成为晚清极富盛景的一道风景线。

参考文献：

- [1] 张静庐. 中国出版史资料·补编：第 6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 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6.

- [3] 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266-274.
- [4] 陈平原.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 1 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114.
- [5]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6] 阮恒辉. 我国近代文学期刊编目[J]. 文献, 1979(2): 244-258.
- [7] 郑逸梅. 书报话旧——郑逸梅作品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7.
- [9]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 大华出版社, 1971.
- [10] 宋原放, 李白坚. 中国出版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 243.
- [11]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87.
- [12] 方卿. 图书营销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7.
- [13] 唐振常. 上海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730.
- [14]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1840—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25.
- [15] 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12.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56 页)

- [41] 程大昌. 华清官图·温泉说[M]//雍录: 第 4 卷. 黄永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83.
- [42] 地理二·河东道·潞州[M]//刘昫, 等. 旧唐书: 第 39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476.
- [43] 宋敏求, 李好文. 县六·醴泉[M]//长安志·长安志图: 第 16 卷. 辛德勇, 郎洁, 点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 493.
- [44] 百官上·十六卫[M]//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 第 49 卷(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281.
- [45] 地理一·关内道·华州[M]//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 第 37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64.

(责任编辑: 白丽娟)

制, 并建立人们之间新的公平公正的关系,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可以看到, 面临社会变革的任务, 各阶级、社会团体都制定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 这些对革命家的行为要求首先反映了参与革命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纲领、目标、斗争方式。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发现, 整个革命史中对人个体及生命价值的轻视态度在逐渐增长。十二月党人走出参议院广场, 用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冒险, 拒绝人民流一滴血, 平民知识分子试图达成期望的人民革命, 为了实现目标准备牺牲部分人的生命, 无产阶级运动则将人民大众引入革命进程。这样, 人的生命渐次暗淡和贬值于伟大的目标。

革命的道德原则引导我们面对一个对人类今后时代而言如此紧迫的问题——人类活动的目标与方式的关系。因为矛盾是难以根绝的, 按照辩证法, 这是发展的结果, 人类不得不永远寻求解决问题的智举。

- [1]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1[M]. М., 1960.
- [2]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декабристов: Т. 1[C]. М., 1951.
- [3] 李显荣. 巴枯宁评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2: 9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5] 周厚琴. С. Г. 涅恰耶夫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恐怖主义[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 [6]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0[M]. М., 1960: 315.

(责任编辑: 李秀荣)